

施金炎 编著

中国书文化要览

顾廷龙题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施金炎 编著

G2
93-26

122535

中国书文化要览

(古代部分)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中国书文化要览(古代)

施金炎 编著

责任编辑：曾 卓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印张：13.25 字数：340,000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300

ISBN 7-5355-1401-4/G·1396

定 价：6.20元

编 例

一、本书收录上古至1840年关于中国书文化方面的重要史实，主要包括文字、书史、出版发行事业、图书馆事业、分类与目录、工具书和历代名著等几个方面的内容（详见本书第357页“分类索引类目表”）。

二、收录标准：关于古代藏书家，一般收录有藏书楼、或有藏书千卷以上、或有重要藏书活动者；关于刻印，以刻印者（刻印机构）为主收录，一般不以刻的什么书为收录标准（重要著作除外）；关于工具书和历代名著，主要收录今人在历史（通史）、书史、文献学、版本学和图书馆学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中提及的、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著述，但图书馆学、分类与目录学等专著则尽可能收录。其它内容的收录标准大抵类此。

三、全书正文为编年纪事，少数大事兼述本末。

四、纪年以公元为主，辅之以帝王年号，用圆括号括起。

五、数朝并立，除三国分别注明各朝年号外，其余如东晋十六国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国、宋辽夏金之帝王纪年，则分别以东晋、刘宋、齐、梁、陈；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；宋（北宋、南宋）之帝王年号为主，其余各朝，仅于涉及该朝之条目内，以圆括号注明其帝王年号。

六、前后两朝年代交错，以前朝帝王年号为主，直至其灭亡止；后朝史实，则于该条目中以圆括号注明其帝王年号。

七、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；而月、日系农历，故用汉字，一月一律用正月。叙述用数字，一般用阿拉伯字，引文数字，

则用汉字。

八、条目排列，以时间为序。日期无考者，排于该月之末；月、日无考者，排于该年之末；连续起迄年（月、日），按起年（月、日）排，起年相同，按迄年排；同年（月、日）者，按本书所编分类索引所列类目次序排。

九、有关人物条目，其史实有具体时间者，按其时间排；无具体时间，一般按人物卒年排；卒年不详，则按生年排；生卒年均不详，则按其确定在世时间排。

十、对尚无定论之说，以一说为主，兼注他说，连同笔者有关补述、注解之语，均用方括号括起。

十一、书后所附分类索引，仅依每个条目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归入一个类目，一般未作互见；综合索引，亦仅列主要人名、书名、国家藏书机构名称等。读者在使用时，可根据需要，相应扩大检阅范围。

目 录

编例	(I)
序	(1)
论中国的书文化(代自序)	(3)
约30000—3000年前(远古——夏、商)	(6)
约前1066—前771年(西周)	(9)
前770—前476年(春秋)	(12)
前475—前221年(战国)	(16)
前221—前206年(秦)	(19)
前206—25年(西汉)	(21)
25—220年(东汉)	(29)
220—265年(三国)	(37)
265—316年(西晋)	(41)
317—420年(东晋)	(46)
420—589年(南北朝)	(52)
589—618年(隋)	(73)
618—907年(唐)	(78)
907—960年(五代十国)	(110)
960—1279年(宋、辽、夏、金)	(120)
(一) 960—1126年(北宋)	
(二) 1127—1279年(南宋)	
1279—1368年(元)	(204)
1368—1644年(明)	(224)

1644—1840年（清）(279)

附：

分类索引(357)

综合索引(371)

中国书文化之光

——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序

书文化，这是个陌生而又似乎十分熟识的概念。说陌生，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——它是一个创造。说熟识，它如“孔孟文化”、“群众文化”、“茶文化”、“酒文化”一样，顾名思义，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。

然而，书文化在各种文化中却占有特殊的显赫地位。正当我思考这一问题之时，湖南图书馆施金炎同志送来了他的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书稿，我欣然应之作序。

什么是书文化？本书作者认为：从书的产生到发展，留下了一系列纵向的关于书的文化遗存；从书的生产到利用，又发生着一系列关于书的社会文化现象。书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存在和发展的总和，就是书文化。

书文化的范畴是什么？作者也有论述：文字；各种形态的书及其载体；书的内容；书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其实体；书的收集、整理、典藏、保护和利用过程及其实体；关于书文化的各种建筑、设施、设备和现代化技术；伴随书形成过程中的各个学科；关于书的政策、法令、组织管理机构及其职官等等。从有关事业角度来说，还包括出版事业、印刷事业、图书馆事业、情报事业、档案事业、声像事业等等，这些都属于书文化的范畴。

书文化有巨大的社会功能。人类孕育了书文化，书文化又积累、保存和发展了人类文明。实践证明，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的巨大力量。

关于书文化的科学定义、书文化的内涵外延、书文化的社会功能等问题，留待有关专家学者们进一步去探讨。但，作者提出书文化这个概念，倡导从宏观角度和运用系统论方法来研究这一文化现象，找出其发展规律，进而统筹安排、合理布局、加强横向联系，以促进有关书的各项文化事业更好地协调一致地向前发

展，振兴中国文化大业，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。

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一书，正是作者这一学术思想具体实践的结果。它将上述有关书的各个方面重要史实熔为一炉，使读者一册在手，既可纵览我国古代书文化发展的概貌，又可从中领略各项书文化事业相互促进、交相发展的风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可说是第一部中国古代“书文化史”。

本书作者以严肃负责的态度，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书文化史料，进行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筛选工作，尽可能将其中重要史实收录入书，并做到事必有据，不妄加评论，从而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。书后附有“分类索引”和“综合索引”，其排比得当，检索便捷。读者既可从中获得有关书的历史知识，又可借以查证有关史实，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进行书文化史的研究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又是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书文化工具书。

在编纂上，本书基本体例为编年纪事，对特别重大的史实兼述本末。每事文字长短不拘，以叙事明晰为度。在编排方法上，较好地解决了编年体对于数朝并立和前后朝交错等难于处理的矛盾，使每事所附帝王年号，既清楚了，又不重复累赘。

应该说，编著这样一部跨越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史料，难度是相当大的。作者已是人到中年，不但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，而且肩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与人合著《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》之后，两易寒暑，数度考订修改，完全利用业余时间撰成此稿，喜获科研成果，实在难能可贵。这种自强不息，坚韧刻苦治学的精神，这种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，体现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。

本书是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的第一部分——古代部分。我们希望它的姊妹篇——近现代部分早日与读者见面！

《中国书文化要览》一书的出版，使得中国书文化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工作者来深入的研究书文化，使中华书文化之光，迸发出更加迷人的智慧光彩！

高占祥

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于京

论中国的“书文化”

(代自序)

今天，广义的“书”，已经演化成为一切载有知识信息之物的总和了。中国书，从甲骨典册到今天的视听资料，其形态和载体发生过千变万化；而当代有关图书的事业，如出版发行事业、图书情报事业等等，则十分广泛而庞大。因此，从书的产生到发展，留下一系列纵向的关于书的文化遗存；从书的生产到利用，又发生着一系列关于书的社会文化现象。书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存在和发展总和，就是书文化。

中国书文化，即从文字的产生算起，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了。中国灿烂的书文化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、逐步发展起来的；当然，也是与各国书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。今天，我们提出“书化文”这个概念并以中国书文化为例，讨论它的范畴、社会意义及有关规律，旨在引起人们从宏观角度和系统论方法研究这一文化现象，以促进书文化事业更快发展。

一、书文化的范畴

书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一样，是由多种文化成分构成的。按其构成成分的内容性质来分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文字（含图画、记录符号和现代书中的某种信号等等）。没有文字，也就不会有书。文字是书的基本要素。

2. 各种形态的书及其载体。如甲骨文、金石、竹木、兽皮、织物、纸、磁盘、磁带、光盘各种载体，以刻画、抄写、印刷（复制）和以现代技术制作而成的各种图书文献。这是书文化的躯壳。

3. 书的内容。图书产生、存在和发展的价值，全在于它的内

容；它对人类的主要作用亦在于此。书的内容是书文化的灵魂。

4.书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其实体。这主要包括著述编辑、出版发行、印刷事业等。

5.书的收集、整理、典藏、保护和利用过程及其实体。包括校勘、考订、图书情报事业等。

6.关于书文化的各种建筑、设施、设备和现代化技术。

7.伴随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各个学科。如文字学、图书学、文献学、编辑学、出版发行学、图书馆学、情报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辑佚学、金石学、印刷术等等。

8.关于书的政策、法令、组织管理机构及其职官等等。

另外，还可从书文化的有关事业角度来划分，则可分为出版发行事业、图书馆事业、情报事业、档案事业、声像事业、印刷事业（部分内容）等等。由此构成了整个书文化系统。

二、书文化的社会意义

今天的图书资料，人们已经把它与能源、材料并列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。但是，这仅仅是书文化中物的作用。在整个书文化中，还存在着更重要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。例如，各项书文化事业及其组织机构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。它们不仅具有促进书的生产、利用和发展的职能，而且还为着按照一定的世界观改造社会和自然去能动地生产书，利用书，向读者宣传、推荐书，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这种作用对社会的意义是非常之大的。在整个人类文化中，书文化属于那部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的精神文化范畴。

人类孕育了书文化，书文化积累、保存和发展了人类文明。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的巨大力量。

今天，我们研究书文化，还有着它深远的现实意义。在中国古代，各项书文化事业基本上是一体的。例如，宋初设立掌管图书的秘书监，就既负责“掌古今经籍图书、国史实录、天文历数之事”；“掌修撰日历”；“掌集贤院、史馆、昭文馆、秘阁图书，

以甲、乙、丙、丁为部，各分其类”；还“掌校仇典籍，判正讹谬”等等（《宋史·志》卷一百六十四，职官四）。实际上，从秦汉以至清代，政府的书文化机构，基本上包揽图籍的访求、收藏、阅览、流通、整理、校勘、分类、编目，以及编辑、刻版印刷和发行等各项工作。许多私人藏书家也是如此。

三、历史的启示

中国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充分就明，书文化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水平休戚相关。书文化从摆脱原始形态以后所发生的三次大变革，每次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。第一次是载体——纸的发明；第二次是生产技术——印刷术的发明；第三次则是载体、生产技术和利用技术等方面同时进行的大变革，即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现代化技术的应用。

没有纸和印刷术的发明，没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，书文化决不会发展到今天的高度。

因此，我们今天要认真研究书文化的发展史，积极发展中国书文化事业，使之更好地为振兴中华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。

愿大家共同努力，为此做出贡献。

（原载1991年5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）

约30000—3000年前 (远古——夏、商)

约30000—10000年前(远古时代)

上古时最早是用结绳来纪事，后来才用文字代替。〔《易·系辞下传》载，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”。〕

相传伏羲氏作八卦，造书契。〔《尚书·序》载，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治，由是文籍生焉”。〕

约7000—5000年前(仰韶文化时)

出现刻划符号和刻划文字。〔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，在今河南省澠池县仰韶村一带，其彩陶上刻划各种符号。郭沫若《古代文字的辩证的发展》称，“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，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，或者中国文字的子遗。”“半坡遗址的年代，距今有六千年左右。我认为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。”〕

出现笔。〔梁思永《小屯龙山与仰韶》称，其时彩陶花纹与符号，均为毛笔所画。〕

约4500年前(大汶口文化后期)

产生图像文字。〔1959年于山东莒县及诸城出土属大汶口文化之陶器上，有与甲骨文极为相近之图像文字。〕

约4400—3800年前(龙山文化时)

出现类似数码与单字之诸种符号。〔龙山文化又称“黑陶文化”，在今山东省章丘龙山镇。其出土之黑陶上，刻有竖、横、竖加横、竖钩等，且有类似数码与单字之符号。〕

《竹书纪年》载，“黄帝轩辕氏五十年秋七月，龙图出河，龟书出洛，赤文篆字，以授轩辕”。

《易·系辞上传》载，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。

约前1562—前1551年(汤)

汤伐桀，出征前作《汤誓》(战前动员)，汤即位，平宣海内，咎单作《明居》(陈述居民之法)，天下始定。

约前1562—前1066年(商)

甲骨文出现并用于记事。王室占卜时，将卜辞与少数纪事刻于龟甲兽骨之上。

陶文与卜辞中均有记数文字，除单位数外，尚有十、百、千、万，复位数已记至4位。能作一般算术运算，并绘制较复杂之几何图形。

出现典籍。〔《尚书·多士》载，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有意识地收藏甲骨，是为中国古代藏书之启始。〕

约前1544—前1533年(帝太甲时)

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，言烈祖之德；作《肆命》，陈政教所当为；作《徂后》，言成汤之法度，以教太甲。又作《咸有一德》(陈述君臣皆应有一德)。太甲立3年，不明，暴虐，由是伊尹放逐太甲于桐(今河南虞城东北)。居3年，悔过反善，伊尹又迎太甲而授之政，并作《太甲训》3篇，以褒之。

约前1532—前1514年(帝沃丁时)

伊尹卒，沃丁以天子礼葬于亳，亲临丧3年，以报其德。于是，咎单作《沃丁》，述伊尹之事以戒王。

约前1400—前1200年(帝中丁——帝祖庚时)

其间，甲骨文有以毛笔和墨汁书写而未契刻的文字。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，已出现表示笔的字：“以”、“𠄎”(聿)

约前1312—前1285年(帝盘庚时)

盘庚迁殷，民有怨言，乃作《盘庚》3篇，以安臣民。

约前1312—前1066年(帝盘庚——帝辛时)

自盘庚迁都(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)至商亡，其文字记录——甲骨文藏于今小屯村。被认为是当时之国家图书馆或者档案馆。

约前1300—前256年(帝盘庚——周赧王时)

是时出现将文字铸或刻于青铜器上之情形，后人称之为“铭”。

约前1271—前1213年(帝武丁时)

陈梦家《殷墟卜辞综述》称：“……刻辞涂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，都盛于武丁一时。”

约前1121—前1109年(帝文丁时)

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戊而作“司母戊”青铜鼎，或称“后母戊鼎”。鼎为长方形，四足两耳，重875公斤。有铭文“司母戊”，或译为“后母戊”，故名。〔一说为商贵族为祭祀其祖先母戊而作。〕

约前1066—前771年 (西 周)

约前1066年(武王四年)

武王伐纣，灭商。是年前后，铸铭文于礼器利簋底，共4行32字。

《逸周书·尝麦解》载，是年，“大史美刑书九篇……乃藏于盟府，以为岁典”。

约前1066—前771年(西周)

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，设有搜集资料之人员与场所。据《周礼注疏》载，是时设有所谓“五史”，即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。“大史，下大夫二人，上士四人；小史，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；府四人，史八人，胥四人，徒四十人。”“内史，中大夫一人，下大夫二人，上士四人，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府四人，史八人，胥四人，徒四十人。”“外史，上士四人，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胥二人，徒二十人。”“御史，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其史百有二十人，府四人，胥四人，徒四十人。”其职掌是，大史“掌建邦之六典，以逆邦国之治；掌法以逆官府之治；掌则以逆都鄙之治”，所藏“皆副写一遍”；小史“掌邦国之志”，与大史别职而同官；内史，“执国法及国令之贰”(即王命之副本)；外史，“掌书外令(帝王下达于四方的命令)，掌四方之志，掌三皇五帝之书，掌达书名于四方”等；御史，“掌邦国都鄙及养民之诏令”(即王令之原始资料)。此后各朝御史兰台书藏，成为国家主要图书馆。

周代官府中设府和史，《周礼注疏》载“府掌官契以治藏”，“史

掌官书以赞治”（即负责典藏档案资料）。

周代司书，“掌邦国之六典，八法、八则、九职、九正、九事，邦中之版，土地之图，以周知入出百物……”（《周礼注疏》）。即国家之重要法典，财税法规，税源资料，收支状况，国家财政及民间资产的纪录，并且考核监督税务官员。

《周礼》称：“小宰听闾里以版图。”“司书掌邦中之版，土地之图。”“司会掌版图之贰。”“内宰掌书版图之法，以治王内之政令。”“大胥掌学士之版。”“司士掌群臣之版。”“司民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。”

《周礼·内史》称：“王制禄则赞为之，以方出之”。〔杜子春注：“方”，即“牍”也，“牍，书版也”。〕

约前1063年（成王三年）

周公作《君奭》，以表明自己忠于王室，非为后代子孙而迷恋禄位。

约前1061年（成王三年）

成王伐东夷之后，息慎（即肃慎族）遣使来贺，王命大臣荣伯作《贿（赐）息慎之命》，以示答谢。

约前1060年（周成王四年）

周公封康叔于卫，以其年少，及作《康诰》，又作《酒诰》，命其戒酒；再作《梓材》，告康叔为政之道。

约前1056年（成王八年）

周公先后作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〔实际年代不明，据《史记》系于成王亲政之后，故列于此。〕